

序 言

林厚科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南方土地改革、“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期间，经历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从战争的废墟上改造和建设新生的共和国，经历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

本书记述的正是从土地改革、“三大改造”、五七年“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中的历史片断。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过程中，有可歌可泣、永世难忘的感人故事，也有对满腔热忱、任劳任怨、追求理想的讴歌；有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鱼水相依情怀的回忆，也有在运动中

无端受屈，祸从天降的苦辣辛酸……

岁月如歌，也如烟。历史象一面镜子，总是要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尘封往事里，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前进与退却，常常交织在一起，积淀了人生的千姿百态，编成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令人深省，催人奋发。本书的作者亲身经历这一历史进程，其感也深，其情也切。

在新一年到来的时候，二十一世纪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让我们以史为鉴，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深刻理解和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脚踏实地勇往直前。这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小册子的初衷。

在编辑此书过程中，南方大学四会校友会及全体同仁全力给予鼎力支持。籍此一并致谢。是为序。

二〇〇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作序者：四会市政协副主席)

参加土改及三大改造 工作的回顾

邓炯华

1951年7月，我考入了南方大学。在校期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列主义的理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为后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1年12月上旬，叶剑英校长亲临南方大学，在草棚大礼堂向全校近万名师生作思想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广东的形势，最后号召全体师生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帮助农民翻身解放。叶校长声音十分洪亮地强调指出：“秀才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并希望全体师生不要错失千载难逢的良机，积极投身土改运

动，在伟大的斗争中锻炼自己。聆听叶剑英校长报告之后，各班组开展热烈的讨论，一致拥护和响应党中央和叶校长的伟大号召，争先恐后地写志愿书、决心书、保证书，迎接千载难逢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喜日子的到来！

1951年12月中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所在的二十三班的185名学员在班主任张粤和黄嫣娜老师的率领下，在广州大沙头码头乘船向西江地委所在地——肇庆进发。

我们到达肇庆后。当时的西江地委书记梁嘉及其他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和接见，并向我们作动员报告，讲解土改政策，宣布土改纪律（十大守则）。经过几天的学习，最后决定二十三班185名师生分配到广四县（那时广宁县与四会县合并为广四县）参加土改。12月16日我们乘船出发，当天就顺利地抵达四会县城。次日，县委第一书记樊金保同志和第二书记欧新同志在龙江河边的胜利戏院接见我们，欧新同志作了讲话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叶永禄同志向我们作了生动精彩的报告。我们再次学习土改政策和土改纪律中的土改队员十大守则，明确土改步骤和工作方法。最后公布名单，我被分配到上茆乡土改工作队。

我们进驻上茆乡的土改队到达目的地以后，领导选择麦寨为土改队部，陈茵（女）、谭作桐、彭乐天和我共四人留守队部，其他同志分别进驻各个自然村。谭作桐同志和我，在麦寨村经过访贫问苦调查了解后，确定又穷又苦勤劳俭朴的志坤妈（麦志坤的母亲）为土改根子，并搬到他家“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作为依靠对象，并通过她去发动和团结更多的贫苦农民。

在开展土改工作中，首先碰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因为我生长在梅州客家地区，在家乡蕉岭县时所讲的全是客家话，因此对四会方言一窍不通。于是决心像初学讲话的娃娃一样从零开始，勤学苦练，做到“学者不羞，不耻下问”，虚心向当地群众和会讲广州方言的同志请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群众会上我就能讲出比较流利的广州话。为后来的工作顺利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对敌斗争中的几次考验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非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必然会受到

阶级敌人的反抗和破坏。特别是江谷地区反动势力最为猖獗，有国民党反动头子张建忠的残余势力，有臭名远扬的土匪头子冼跛喜的残匪，有反共救国军（又称地下军）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混进乡公所里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俗称旧基层人员）和社会上的官僚地主的爪牙以及流氓地痞等坏人。他们结成一股力量，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进行捣乱与破坏，四处造谣蛊惑人心，制造各种事端挑起宗派械斗。更可恶者曾出现暗杀土改队员和土改根子后把人头和尸体分别挂在大路边树上示众的惨剧，妄图威胁土改队员和群众，达到破坏土改运动的罪恶目的。为了镇压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开展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的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一天黄昏，队部接到区里的紧急秘密通知，部署新的战斗任务，明天统一行动抓捕反动分子。因此，必须分别把这个通知当晚就要送到各工作组那里。我自告奋勇接受这个任务，吃过晚饭后，我独自出发，左手握着电筒，右手持着短枪，顶着凛冽严寒，冒黑走崎岖山路，整整花了

三个多小时，终于胜利地完成任务。这次任务的胜利完成，给领导和其他同志一个很好的印象，受到他们的称赞。

在镇反运动中，我还亲自参加过抓捕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一天下午，土改队领导陈茵同志通知我和陈龙华同志到队部，她说：“现在有个紧急任务委派你们去执行，要到30多公里以外的龙甫小学抓捕混进教师队伍的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分子邱××，今晚就要行动出发，否则会耽误战机。接受任务后，吃过晚饭，我两人带上手电和一条新麻绳便出发。经过夜行九个多小时，次日拂晓到达了龙甫小学。我俩就地休息片刻，等学校开门以后，首先找到了校长说明来意并请他支持，然后校长把邱××（抓捕对象）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两人机警地分别站在邱某的左右两侧，严肃地宣布：“我们是广东省广四县的土改队，奉命前来抓捕你”并命令他举起双手不准乱动，向后转身下跪在地，立即掏出麻绳把邱××捆绑起来。在学校吃过早餐并付了伙食费以后，我和陈龙华同志一前一后押解着邱××返回队部

当时，各工作组还抓获各类反革命分子多

人。临时集中关押在一个地方看守，分别进行初步的审讯，过了两天要把他们押送到县公安局去。这次押送的任务无条件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清楚地意识到任务的艰巨和责任的重大，同时也是锻炼和考验自己的极好机会。在出发之前，其他同志则事先把8个犯人一个一个地捆绑好，然后每隔一米左右人与人之间再连环捆着绳子防备他们逃跑。我站在8个犯人的面前，训戒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要执迷不悟，只有向人民低头认罪，主动坦白交待罪行才是唯一的出路。喝令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向四会县城的方向行进。经过大约4个小时的步行便抵达了县公安局看守所，办理好交接手续和吃过午饭后，我有如释下了千斤重担，匆匆地离开县城，愉快地踏上归途。

土改中先行点的工作

1952年春夏之交，因工作需要，我由江谷的上茆乡调到四区（现在的石狗镇）讴善乡进行土改工作。当时全乡有9个行政村。地方干部杨士杰和程石金进驻一村（梅仔坑村），南大学员郭少微和另一位同志进驻四村（鸦寮洞村），赫

德田同志（南下大军副连长、区委委员）、王桂琢同志（南下干部）和我以及谭作桐、陈志钧（均是南大学员）共五位同志进驻二村（企山傍村）作为先行点并指导面上的工作。具体做法和步骤大致是经过如下的阶段：

（一）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赫德田同志是外省人，不懂地方语言，他负责全面的工作，我是他的助手兼翻译员。我们两人经过深入访贫问苦调查摸底确定苦大仇深的陈二女和张兰娇为土改正、副根子。通过“三同”逐步建立了阶级感情，他们便开始反映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过了几天，进驻各村的同志到二村参加碰头汇报会。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各村必须及时召开群众大会，大造宣传声势，解决群众的各种顾虑。（1）说明来意。讲明土改队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帮助农民翻身解放的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2）宣传政策。讲清土地改革的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3）表示态度。着重表明土改队“三不走”的决心，即：群众没有真正发动和组织起来不走；农民自己当家作主

的农民协会没有建立起来不走；恶霸和地主没有打垮，田地、耕牛、农具、房屋没有分好不走。号召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严厉警告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坏分子，不得乱说乱动蛊惑人心，否则，就实行严厉的制裁。

在大张旗鼓宣传的同时，土改队的同志深入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提高根子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贫苦并不是命运不好。而是受“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把仇恨集中到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恶霸、地主和官僚资本家身上。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发他们认识到只有受苦受难的群众自觉地组织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当家作主；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展对地主、恶霸的斗争，达到翻身解放、分田分地、政治上不受压迫、经济上不受剥削过共同富裕的好日子的目的。开展同心串同心的串连工作，在工作组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地把最贫最苦的贫雇农都串连起来了，阶级队伍逐步得到扩大。

（二）集体教育，巩固提高。

由于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人数越来越多，

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因此思想觉悟也有高低不同之分。工作组的同志把经过诉苦挖根的贫雇农集中起来进行短期的培训，教育的内容着重抓住几点：（1）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是谁养活谁？（2）穷人为什么那样苦？富人为什么那样狠？（3）风水、家山、命运是不是穷与富的根本原因？为什么？（4）贫苦农民的力量大还是一小撮地主的势力大？这是为什么？（5）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他们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在上述各个专题的讨论中，事先都培养好一至二个典型发言，然后进行热烈的争论，最后由工作组组长同志综合发表意见进行系统的分析，达到集中教育巩固提高的目的，为开展对敌斗争作好思想上的准备。

（三）掌握政策，划分阶级。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阶级的划分是一项非常严肃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关系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关键问题。为了使阶级划分达到“稳、准、好、快”的要求，土改队员首先集中到区里进行培训，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文章和中央颁发的阶级划分的标准。划

分过程中最难确定的是贫农与中农之间，富裕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界定。在这个关系到“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都保持十分认真和慎重的态度。

在群众开展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大致经过以下步骤：（1）反复学习阶级划分的标准，把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2）自报登记。首先各户详细阐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经济主要来源的情况，然后自报阶级成份，进行登记造册。（3）群众评议。在自报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评议。（4）三榜定案。将群众评议的结果张榜公布，评为贫雇农的贴红榜，评为中农的贴黄榜，评为富农的贴蓝榜，评为地主的贴白榜。公榜后如有不同意见，可向工作组反映，经过一次、二次、三次公榜没有再提出异议后作为最后定案。分清了敌、友、我的阶级阵线。

（四）民主推荐，成立农协。

农民协会是农民行使权力的临时组织机构，在当时还未建立政权的过渡阶段，一切权力归农会，代替行使政权。它是通过民主推荐、工作组审批建立起来的。首先各行政村组建农协小组，然后组建全乡的农民协会。参加农协组织的成

员，绝大部分是贫雇农的优秀代表和个别下中农的先进代表人物。第二行政村农协小组的组成人员共五人，正副组长分别由陈二女、张兰娇担任，组员由潘水、潘石友、潘淦泉（下中农）担任，充分体现了党在农村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农协的建立，为以后开展对敌斗争、分田分地作好了组织准备。

（五）分化敌人，开展斗争。

为了取得斗争的全胜，工作组和农协从多方面做好准备工作：（1）确定斗争对象。根据掌握的材料和贫雇农的迫切要求，确定第一个斗争对象是大地主潘元忠。他是国民党的伪保长、伪乡长，解放前在乡村中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养婢女雇长工，出租土地和高利贷剥削群众，强拉壮丁和杀害过我游击队和地下党人，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此必须把他斗倒斗垮斗臭。（2）组织训练队伍。把曾经受过潘元忠剥削和迫害苦大仇深的苦主集中起来进行战前练兵，开展小型批斗会，为人型批斗作好准备。（3）分化瓦解敌人。特别是对地主的婢女和长工，他们是最知情者，激励他们站在贫下中农这边，大胆地揭发地主分子的罪行。对地主家属（例如地主的儿媳和十八

岁以下的子女）区别对待，把他们视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他们与地主分子划清界线，大胆进行揭发，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4）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对敌斗争。（5）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斗争水平。每次斗争大会结束以后，工作组的同志和农协成员都进行一次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和克服缺点。为了真正达到既斗垮敌人又教育群众的目的，我们组织了以乡为单位更大规模的对大地主潘元忠的斗争大会（包括所有的地主分子参加陪斗）。根据潘元忠的罪行和二次斗争中的顽抗恶劣态度和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经请示上级批准，进行第三次斗争后，就地执行枪决。随后，对其他的地主分子也陆续开展了批斗，地主分子曾繁轩，是比较有名的老中医，为群众做了些好事，经过群众的批斗，对自己的剥削罪行有悔改表现，表示把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黄金白银等）交由政府和人民处理。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他本人较好的认罪态度以及群众的意见，经工作组研究请示上级批准，免予刑事处理，交给群众监督管制，继续行医将功赎罪。对潘元忠和曾繁轩

两个地主分子的区别对待，也充分证明党的政策威力，更好地震慑和分化阶级敌人。

（六）分配果实，填坑补缺。

在政治上打垮地主的威风之后，还必须进一步彻底摧毁它的经济基础。根据土改时党对地主的政策，工作组和农协小组，把没收地主的财富作为斗争的胜利果实，全部分给贫雇农和比较贫困的下中农。分配的原则是：“填坑、补缺”，即优先照顾雇农。其次根据当时当地的生活水平按补缺的原则，分给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分到了土地、鱼塘、山林果树、房屋、耕牛、农具、家具、衣物和现金等胜利果实以后，个个笑逐颜开欢天喜地。

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胜利完成了先行点的任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后来全面开展土改运动铺平了道路。

为三大改造运动作贡献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鉴于当时新解放区干部奇缺，为充实当地干部队伍，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批准，将南大师生提前分配，就地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于是，原来参加四会土改的南方大学

几百名师生，从此就象红色的革命种子分布各机关、部门和基层，在四会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1953年夏，我被分配到四区区委办公室工作（兼宣传干事），充当五员角色（区委资料员、书记翻译员、宣传指导员、报社通讯员、人民勤务员）。当时的区委书记由县委组织部长郑永祥同志（南下干部）兼任。根据中央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指示精神，区委决定组织农村工作组，由疗健良、赖西旺、卢彩意（女）和我等同志组成，疗健良同志任组长。工作组选择石狗乡岗咀李村为合作化的试点，以土改积极分子、翻身农民高水成为骨干串连发动十八户贫下中农办起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同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克服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的特点，就是把注意力由互助组转向更多地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12月中旬，区委集中全体区干部学习中央的决议和进行年终工作总结，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会后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我被吸收为

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54年春，农村工作组改称办社工作组。当时，以原有高水成互助组为基础，进一步兴办土地、耕牛、农具入股，实行统一经营。以村为单位成立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定名为：“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幸福社）。由办社工作组长疗健良同志兼任社长，高水成任副社长。“幸福社”的建立，给广大农民树立了走社会主义幸福大道的旗帜，标志着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过幸福生活的开始。在幸福社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区很快地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54年夏，我被上调到中共四会县委宣传部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宣传部的同志根据中宣部的提纲精神，结合实际，编写各种学习和宣传资料，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在机关干部和职工中迅速掀起学习总路线的热潮。并动员部分干部参加“一化三改”的实践。我曾一段时间到地豆“农家乐”社